

珠三角企业生存困境调查(下)

昂贵的工人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实习生 林穗青 林晓茵 张智慧

阿迪达斯选择关闭其在华唯一工厂之前,另一行业巨头耐克就已经关闭中国生产线。

时间再往前追溯,在阿迪达斯和耐克撤离之前,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也已纷纷将生产线设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

分析人士指出,耐克、阿迪达斯等外资服装巨头纷纷关闭在华工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近年不断上升。

人力成本吞噬企业利润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东莞长安振安工业园看到,华南电子厂打出“月综合收入3000元”的广告,不远处的思拓厂的广告是“诚聘男女普工,月综合工资2100—3200元”。

人力成本上升让企业主们头疼不已。

东莞洪宇鞋业公司的严老板告诉记者,现在利润率本来就不高,如果员工工资涨得过快,将使企业面临无钱可赚的风险。

此次在东莞的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家族企业经营一间机械加工厂十多年,四五年前人工成本开始上涨。为了留住工人,工厂给工人每年平均加10%工资,还提供四人宿舍与一天三餐的待遇。到了2010年,用工成本“疯涨”。普通一线工人2000元都留不住,一线工人几个核心岗位工资更是超过5000元。最后,高昂的成本让企业几乎没有利润可言,不得不推掉部分订单,辞退部分工人。

商务部研究员金柏松调查发现,东莞的纯代工制鞋企业,人工成本占80%左右,高端制鞋企业的人工成本占18%。

记者了解到,不断上涨的物价和新生代劳动力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使得工人们对于工资标准有更高的要求。此外,常年持续的“用工荒”也促使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人成本压力大增。

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也正在逐步减弱。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是东南亚的两倍。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资料显示,与中国相比,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相对于我国内地,去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中国工人已经达到413美元,是越南和印尼的二倍以上,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的确很敏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认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人力成本已经开始超越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利润较低、相对简单的产业,比如服装业,很多跨国企业将生产工厂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

易定红分析,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除了物价上涨等因素外,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副所长杨黎明表示,虽然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的趋势不会改变,但经济增速放缓已经影响到企业的支



去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中国工人已经达到413美元,是越南和印尼的二倍以上。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一个家族企业经营一间机械加工厂十多年,四五年前人工成本开始上涨。为了留住工人,工厂给工人每年平均加10%工资,还提供四人宿舍与一天三餐的待遇。到了2010年,用工成本“疯涨”,普通一线工人2000元都留不住,一线工人几个核心岗位工资更是超过5000元。最后,高昂的成本让企业几乎没有利润可言,不得不推掉部分订单,辞退部分工人。

付能力,过快的工资增长会增加企业成本,甚至造成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企业主亲自替补工人不足

“看看能撑到什么时候吧,如果大环境继续这样恶劣的话可能就要把工厂给关了。”说起自己工厂的近况时,广东中山的私营企业主陈先生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坦言。陈先生的工厂是做五金机械的,今年因为订单不足,留不住工人,本来二十几人的

“不过都是因为企业效益不景气,约好了一起回家。”

以上是在广东东莞一座公交车站台前,《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的情景。

李胜、张小宇他们是近期大批返乡的务工人员的缩影。

李胜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有二十几个同乡、四五个亲戚都在广东东莞、深圳、珠海等珠三角一带务工,都是在中小外贸企业的制鞋、服装、玩具行业,“最早从去年年末开始,就有二三个同乡返乡后不来了。今年以来陆续有同乡和亲戚回乡,情况最为明显的是这段时间,有一批批的同事返乡。”

“我打电话回家,才知道我们村里在广东一带务工的几个亲戚都回家了,只有一个还没走,原因一是老板多次挽留他,二来他自己还想再坚持坚持,等过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李胜说。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由于外需不振、人工成本过高、税负过重等原因,我国传统外贸企业受到很大影响,以前只有春节前才出现的民工返乡潮,此时却在多地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提前出现。

在采访东莞当地企业主时,多位

机械厂现在只剩下四个工人在职,十分艰难地维持着。

林少文是广东豪达工业模具有限公司的总负责人,他的公司经营模具、模具及相关配件已有20多个年头了。尽管从去年7月开始,许多企业都亏本、停业、倒闭,但豪达工业模具有限公司却在低迷中艰难地维持运营。“今年倒闭的企业多数是员工数量在一两百到五六百之间的企业,这一类企业人多开销大,一没有订单就面临停业危机,不像那些几十人的小公司,靠少量的订单也能勉强维持。”林少文说,“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需要大量人手,以前中国的人力成本低,可以保持产品低价优势,如今工人普遍上涨,因此许多大型制造业企业难以以为继。”

陈先生认为,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技术含量还存在产品单一、依附性强的弊病,这点在机械制造、玩具业、服装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目前这些行业还是劳动力主导而非技术主导,整体的产业结构效益低下,专业性不强,所以这些致命的自身缺陷让它们在经济危机、欧债危机袭来时一蹶不振。

陈先生告诉记者,公司给工人的基本工资在2000到3000元之间,但前年有十几名工人,但从2008年开始逐渐有人离职,离职的主要是嫌工厂环境恶劣的年轻工人。“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我必须亲自动手才勉强维持工厂正常运转。”据陈先生介绍,目前招工很困难,工人自身素质不够却要价高。但公司如果再升工资,就要亏本经营了,实在升不起工资。

后悔未用机器替代人工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莱楠认为,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但“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已经差不多了。”

然而,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对众多中小制造企业而言,转型却面临现实难题。

“生存的压力让我们中小企业感到必须转型,可是转型面临许多现实

问题:怎么转?往哪里转?拿什么转?而且,转型还需要资金、人才、技术方面的支持。”在谈到目前热议的转型问题时,东莞万豪玩具厂的肖经理显得有些无奈。

还有部分中小企业向记者表达了顾虑,企业转型一是需要追加投资,二是未来不一定能够产生效益。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分析称,中小企业转型是痛苦的。“由于工资提高,劳动率并未增加,导致劳动成本提高,低成本优势减弱,使得我国中小企业处于世界两方面夹攻:一是东南亚的人力资源优势,二是高技术国家的技术优势。”

陈乃醒建议,企业如果要转型,首先要管理转型,再也不能依靠过去粗放的管理。二是加大投入,对落后技术进行改造。“企业家要认清形势,淡定情绪,做最熟悉的事,注重专业,踏实苦干,坚定前行。”

面对严峻的客观形势,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率成为当务之急。

东莞洪宇鞋业公司的严老板对《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说,十年前,东莞普通制鞋工人工资每个月才五六百元,那时许多老板认为投资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购买先进设备完全没有必要,低工资足够保障企业利润,正是这种思想让许多鞋厂仅仅满足于代工,且管理粗放,发展缓慢。面对工资成本上涨,再加上订单不足等因素,抗风险能力不高。

“我有个同行朋友,几年前就意识到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的问题,因此在提高管理能力,向管理要效益的同时,还引进先进机器代替人工以提高效率。这几年,他们陆续花费数百万元购买了一些机器和数字化设备以代替人工。”严老板介绍说,“当时我们都不理解,现在明白了,如果说机器替代人工可以提高两倍以上效率,数字化设备则可以提高五至十倍。”

“比如花费五十万元购买一台数字化设备,一年就可以为企业节省六十万元以上的生产成本。”严老板羡慕地对记者说,“一来可以节省生产成本,二来可以减少‘用工荒’的难题,可谓一举两得,太值了。”

下,现在又叠加了一个欧债危机。此外,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国外也在调整,比如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一些鼓励制造业回流来解决国内就业的问题,这样一些新的现象,对我国的就业形势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分析称,当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需求有升有降。升指的是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上升,降低的是对低端、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因此,对长期从事于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民工来说,能否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如何寻找合适的出路是关系就业稳定的一大因素。

采访中发现,一部分务工人员选择返乡以后等待经济形势好转时再出来务工。也有人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考虑外出,而在家乡寻找机会或者专心务农。

“你们在东莞务工这么多年,回家做什么?”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的提问,李胜想了想,回答道,“干什么都行,找工作,务农都行。总比在这里干耗着强。”

谈到未来,几个年轻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走一步说一步吧。”

案例

一个物流企业的税费清单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今年夏天,在物流行业工作了十几年的深圳某物流公司财务经理张添军(化名)不幸成为公司新一批裁员名单中的一员。

张添军所在物流公司的老板姓邹。自2000年开始,邹老板创办了这家物流公司。不久,张添军便从别的物流企业跳槽过来。

张添军说,作为邹老板物流公司的老员工,他亲眼见证了这家物流企业做大,再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

据张添军介绍,在经历了二三年创业阶段的摸索后,这家物流公司从2003年开始迅速发展,每年营收增长率都在30%以上,营业额在顶峰时年达四五千万,员工一二百名。然而从2008年开始,物流公司业绩开始下滑,利润空间越来越少,尤其是今年以来,公司越来越难以以为继。

张添军认为,邹老板的物流公司之所以出现目前的窘境,除了国际经济形势不景气导致订单下滑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税费负担越来越重。

张添军介绍说,因为物流企业属于交通运输业,所以缴纳的税种主要是4类,其中营业税税率为3%、城建税为营业税的7%、教育附加税为营业税的3%、企业所得税为25%。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列举了邹老板物流企业目前重要的税费账单:以营收2000万元为例,需缴纳营业税60万元(2000万×3%),城建税4.2万元(60万×7%),教育费附加1.8万元(60万×3%),印花税1万元(2000万×0.05%),企业所得税65万元(260万×25%)。上述税费加起来一共是132万元,而企业当年利润为180万元,税后利润剩58万元。

税收这么重怎么办?据张添军介绍,通过各种方式偷税已成为物流行业“公开的秘密”,比如少缴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开营业税发票。不开票,既省了营业税的钱,其它税收也跟着“一省”省下来。“要完全按规定缴税的话,公司不会坚持到现在。”

据记者了解,物流企业一方面承担着高额的税收,还要承担重复计税之痛。

与邹老板的物流企业同一行业的广东珠海一家物流公司的总经理刘宁,其主要业务是国际物流。

此前,刘宁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虽然这几年他在国际物流业务上做得不错,但一直没有进入国内物流业务。主要原因是国内物流业各项税赋太多,有12种之多,而且重复征税的现象颇为严重。“比如说仓储,重复纳税比例有时甚至超过50%,企业承受不起。”

此外,企业还要承担各种行政性收费和地方乱收费和罚款的压力,如目前,我国路桥费就已经占整个物流成本的30%左右。

对策

产业转移: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面对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为了减轻成本压力,部分企业转向劳动力更廉价、政府扶持政策更好的国内中西部地区或者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最近几年,业内不断传来东南沿海中小企业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和“进军东南亚”的消息。

今年6月,包括著名的天虹纺织集团在内的13个中国纺织公司向印度尼西亚派遣代表,寻找合适的地点,东南亚掀起一股纺织业建厂的热潮。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总会秘书长表示,“企业是很不愿意搬迁的,但就像以前的台湾企业一样,不出去就是等死。”

近几年来,一些台企正逐渐减少在东莞的投资规模,陆续向西南以及越南、柬埔寨等市场搬迁。

在国内有企业向东南亚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赫赫有名的阿迪达斯关闭其在华唯一工厂“迁徙”到东南亚,是否会引起“蝴蝶效应”从而带动国内企业新一轮的“迁徙潮”?

体育产业独立评论人马岗表示,这是一个“大转移和大转型”的信号,阿迪达斯在这个节点宣布撤出,是市场的规律和产业的周期所致。

据记者了解,在新浪网上“阿迪将关闭国内唯一自有工厂”的调查中,有关“阿迪达斯关闭在华工厂是否因中国制造成本上涨”的调查中,高达81%的网友回答“是”,只有10.3%的网友回答不是,其余的网友则有“不好说”。

在有关“未来会有更多外企将生产线外迁吗”的调查中,有高达90%以上的网友回答“不会”,只有3.5%的网友称“会”。

不过,对阿迪达斯迁厂将在国内产生“蝴蝶效应”一说,业内人士也有不同看法。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表示,东南亚地区除劳动力成本之外,相比中国地区没有丝毫竞争力,该地区的生产配套设施远没有中国大陆齐全,大量的原材料主要还是从中国大陆采购,“阿迪达斯关闭苏州工厂或就是基于整合资源考虑而单纯关闭,不是搬迁”。

在实地调查采访中,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看来,东莞等珠三角企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转移。

另据记者了解,虽然说我国东南沿海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着诸多困难,向国内中西部和东南亚转移也不失为一项重要选项,但真正要完成产业转移并不能一蹴而就。即使要实现产业转移,企业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东莞一家电子公司的林经理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说实话,企业要转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管是转移到国内中西部还是东南亚国家,都不能做到百利无害,比如在基础设施、服务配套、产业链建设等问题上都存在不足。”

林经理介绍说,前年他把工厂一半的产能转移到四川,主要就是考虑内地工资低,比东莞这边少1/3,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劳动力比较丰富,好招工。然而他很快发现,在四川这边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如东莞,还要派人验收,再加上物流成本,考量综合因素,劳动力成本形成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

“去年,我制鞋业的朋友把工厂迁移到越南,去了之后才知道,虽然说越南劳动力成本比东莞低不少,但在配套设施、产业链方面,比国内还是差了不少。所以没有调研详细考虑清楚,不要贸然走出去。”林经理说。

特写

一边工资上涨 一边工人返乡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今年以来厂里效益情况很不好,主要是订单明显下滑,机器总是开开停停,老板很发愁,工人们没事可做,情绪也不是很高。”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东莞一家制鞋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湖北籍的李胜一边整理着行礼,一边神色落寞地说。

“企业不景气,我们的收入就受很大影响,这边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虽然企业也涨了工资,但比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从今年上半年起我们几个人就只进不出。照此下去,谁受得了啊。与其这样,还不如回家算了。”就在李胜说话的同时,站在他身边来自四川的外来务工人员张小宇对记者表示,他所在的玩具厂由于前两年扩大生产规模,资金被大量占用,现在形势不景气,现金流出现问题,企业又借不到款,一直处在半停产状态。

记者看到,在李胜和张小宇的旁边,还有两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使劲地向远处张望。

李胜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张胜是玩具厂的,两人是好朋友,旁边另外两个年轻人,都是自己的老乡,一个在服装企业,另一个在电子企业务工。

“不过都是因为企业效益不景气,约好了一起回家。”

以上是在广东东莞一座公交车站台前,《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的情景。

李胜、张小宇他们是近期大批返乡的务工人员的缩影。

李胜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有二十几个同乡、四五个亲戚都在广东东莞、深圳、珠海等珠三角一带务工,都是在中小外贸企业的制鞋、服装、玩具行业,“最早从去年年末开始,就有二三个同乡返乡后不来了。今年以来陆续有同乡和亲戚回乡,情况最为明显的是这段时间,有一批批的同事返乡。”

“我打电话回家,才知道我们村里在广东一带务工的几个亲戚都回家了,只有一个还没走,原因一是老板多次挽留他,二来他自己还想再坚持坚持,等过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李胜说。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由于外需不振、人工成本过高、税负过重等原因,我国传统外贸企业受到很大影响,以前只有春节前才出现的民工返乡潮,此时却在多地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提前出现。

在采访东莞当地企业主时,多位

企业主表示,今年有相当多的中小外贸企业经营形势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

东莞当地礼品企业主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感叹,由于订单下滑,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方面原因,企业利润进一步压缩,只得艰难维持。“按最高二元一件来算,一件礼品赚一毛左右,一笔订单即使二万件也就四万元,整笔订单才赚二千元左右。这与以往至少几十万元的订单来看,利润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据悉,2008年10月,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东南沿海一带中小外贸企业受到沉重打击,经营状况不佳,发生了民工“返乡潮”。

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这次“返乡潮”的提前出现?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此次一部分民工提前返乡发生的背景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结构性失业在所难免,因此必须理性看待。

中国国际贸易交流中心专家王天龙认为,原因之一是我国外贸形势比较严峻,导致出口订单减少,在外贸加工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出现失业。在没有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